

新中国成立7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新时代的伟大飞跃

田克勤

摘 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过了不平坦的道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主要标志,经过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不懈努力和接力探索,党在带领人民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实现伟大历史性变革的基础上,迎来了新时代,开启了新征程。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置于新中国70年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并使之与新的实践紧密衔接起来,揭示其不断创新发展的内在逻辑,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历史、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而且有助于更好地拥抱未来、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更大胜利。

关键词: 新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时代

中图分类号: D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19)03-0001-7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主要标志,经过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接力探索,党在团结带领人民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过程中,取得了一系列伟大成就,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变革,迎来了新时代,开启了新征程。立足于新时代,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变化为基本依据,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为主线,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深入研究新中国成立7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展示其根本成就,总结其基本经验,分析其内在逻辑,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的成功推进与“第二次结合”的初启及曲折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的成功推进、“第二次结合”的初步启动及其曲折转向的历史时期,大体经过了30年的时间。在这一时期,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任务,进行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此后所进行的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探索,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仍然取得了不少独创性的成果。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任务的完成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2年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觉研究”(16CKS020)

作者简介: 田克勤,男,吉林九台人,东北师范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兼职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底，党团结带领人民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的基础上，以正确认识和把握当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及其变化为主要依据，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基本遵循，经过一系列艰苦复杂的斗争，使我国社会顺利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做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存在着诸多严重困难。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依据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明确提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任务的基本要求，在有条不紊地开展新解放区土地制度改革的同时，进行了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建设。政治上，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残余武装，镇压反革命，召开地方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健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有力地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经济上，通过接收帝国主义在华资产，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归国家所有，建立起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贯彻执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促进各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提供了重要前提；文化上，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买办思想残余，改造旧有教育文化事业，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引导和教育人民成为共同建设国家的社会力量。在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操纵联合国组成“联合国军”对朝鲜发动侵略、入侵台湾海峡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又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进行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捍卫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极大地提振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维护了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党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理论和实践根据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及俄国革命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验，为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和宝贵的经验启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又是同党对我国当

时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以及国际环境变化的认识分不开的，是适应中国实际作出的战略抉择。从1952年9月到1953年2月，毛泽东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完成了从原来设想的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建设，将来“一举过渡”，到现在即开始“逐步过渡”的变化。1953年6月，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做了较为完整的表述。同年12月，毛泽东在审阅“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时又对总路线作出了系统阐述，强调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一个过渡时期，要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从根本上来讲，总路线的实质是要逐步地改变生产关系，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成为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进而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从1953年到1956年，党在领导人民进行“一化三改”的过程中，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土地改革完成后，我国农村社会发生了新变化：一方面，由于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获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空前提高，加上国家对农业给予多方面的扶持和支援，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另一方面，由于小农经济本身所固有的落后、分散、狭小、力量薄弱等特点，农民在发展生产中又遇到了不少困难。面对这一形势，党坚持从中国农业、农村实际和农民的现实需要出发，利用民主革命胜利后所取得的政治条件和物质基础，制定并实行了一整套符合我国实际的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实现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农民走上了合作化道路。对于个体手工业改造同样立足于中国实际，采取了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大致相同的步骤。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运用和平“赎买”方式将资本主义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思想，实现了以和平方式来变革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使命，保持和发展了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

一战线，将马克思主义关于“和平赎买”的设想变为现实。

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积累了一系列宝贵经验，诸如：必须坚持将“一化”“三改”同时并举，采用由初级向高级过渡的合作化形式对农业和手工业进行改造，采取和平赎买的方式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注重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等。在此期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总体上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框架结构，以及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要形式的基本经济政策，从而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宪法根据。

我国在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成功跨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使我国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被彻底推翻，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生产资料的主人，推进我国最终确立了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三）“第二次结合”的提出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

从1956年党的八大到1957年8月以前，党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要求。这一阶段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间不长，但成果十分显著。其中，党的八大报告、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献，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成果，集中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等问题进行了阐述，推进“第二次结合”取得了良好的开端。正如邓小平指出，“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2]，这些思想无疑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南。

从1957年8月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在曲折中艰难前行。在此期间，党的工作发生过严重失误，而党对错误的纠正，又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得到较大发展，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这些成果集中表现在：一是提

出了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要求用50年到100年的时间逐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分“两步走”的设想。二是提出了要完成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过去的政治革命到技术革命、文化革命转变的要求。三是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认为应该把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同社会主义建成加以区别，社会主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3]。四是提出了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要求。要正确处理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引领国民经济不断发展；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交换，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打破高度集中统一的经营管理体制；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学习外国一切好的东西，包括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先进的科学文化，等等。上述一系列思想的贯彻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提供了重要条件。

从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在很大程度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发生了严重的挫折。“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使毛泽东最初形成的以发展经济和文化、进行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为主要内容的新的革命的思想，被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所替代。“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整体而言，党在这一时期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探索，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初期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尽管当时尚未实现质的突破，一些正确的思想后来也未能很好地得到贯彻，但它毕竟是已经提出来了。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也不应该对这些成果采取轻率的态度，而应加以珍惜。正如有学者指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初步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思想理论遗产，“这些遗产，在今天仍然发挥着奠基性的作用，仍然是我们遵循的治党治国的重要原则和方法，仍然有着长久的指导意义”^[4]。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重启、历史性飞跃及持续推进

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文化大革命”，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前，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重新开启、实现突破及持续推进阶段。这一阶段的时间大体上也是30年，所取得的标志性成果就是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理论体系的形成、制度的确立，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拨乱反正、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通过深入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了艰辛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国家和社会主义事业。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所作的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讲话，实际上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为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奠定了重要基础。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重新启动的主要标志。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到党的六中全会对1949年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进行总结，党成功实现了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科学评价，以及对“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概括，标志着邓小平理论初步形成；从党的十二大开幕词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5]的命题，到党的十三大提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发生两次历史性飞跃的判断，系统阐述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理论与党的基本路线，是邓小平理论的不断拓展阶段；从党的十三大以后邓小平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的坚守，到1992年春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明确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等一系列重大思想，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系统形成。

邓小平理论体系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明确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立论基础，突出强调了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要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本质等问题进行了创新性阐述。二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必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将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三是初步建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模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必须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一国两制”来推进祖国统一、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四是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和领导核心，强调人民群众是党和国家力量的源泉，人民军队是人民事业的坚强柱石，党是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三个方面的力量代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主体的意志和利益，是推进理论向实践转化的根本动力。

党的十五大正式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提出的一系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简称为邓小平理论，并将其写进党章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深入揭示了这一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邓小平理论深刻体现了在传统社会主义向当代社会主义模式转变过程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重要性，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呈现出巨大的生机活力，为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奠定了基础。

（二）“第二次结合”的推进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

从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以前，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深刻分析党已经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基础上，立足于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建设什么样

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并对社会主义基本纲领、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问题进行了阐述，成功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江泽民在2000年2月视察广东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三个代表”思想，即“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6]。此后，他又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等讲话中，对这一思想的内涵和要求作出了科学阐释。“三个代表”思想是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深刻反映了时代和实践发展的基本要求，具有十分丰富的思想内涵。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不断推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体现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要实现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利益。

党的十六大系统阐述了“三个代表”思想的指导意义和历史地位，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了党章，从而把推进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工程同党和国家所承担的历史使命紧密衔接起来，赋予党的性质、宗旨和指导思想以鲜明的时代特征。

（三）“第二次结合”的持续推进和“科学发展观”的形成

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紧抓住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在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明确提出坚持科学发展观，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等重要思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并对其内涵作出了概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003年8月，胡锦涛在江西考察时首次使用了科学发展观的概念。10月，他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强调，“树立和落实全面发展、协调发

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7]，对于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具有重大意义。2007年6月，在党的十七大召开以前，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党的十七大还对这一思想的内涵及其基本要求作出了全面阐释。科学发展观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科学发展观是“全面的发展观”，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要求发展经济既不能盲目追求发展速度又不能忽视其他领域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是“协调的发展观”，即实现经济与社会、城市与乡村、人与自然、国内与对外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是统筹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是“可持续的发展观”，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不对后代的发展造成损害，又要正确处理人的发展与生态保护、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统一的发展观”，要求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发展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党的十八大揭示了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和重大意义，将这一思想写入了党章，进一步实现了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这就系统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反映了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水平。

整体而言，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前的30年，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取得了重大进展，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理论和制度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深刻体现了改革开放这一新时期最鲜明的特征、与时俱进这一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快速发展这一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

三、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当今世情、党情和国情的深刻变化，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紧密结合，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及其主要内容

与时俱进地认识和把握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变化，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从世情来看，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但金融危机影响尚未消除，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所上升，影响世界发展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日益增多；从国情来看，当前我国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方位，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但我国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十分突出；从党情来看，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不断提高，各方面建设取得了重大进步，但“四大考验”和“四大风险”的挑战依然存在，党执政面临的形势发生了许多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必须在理论上始终保持高度清醒，立足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党正是基于对世情、国情和党情变化的精准把握，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从党的十八大后明确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是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聚焦点，对“中国梦”战略思想进行系统阐述的阶段，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深刻认识；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是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行集中阐述的阶段；从庆祝“建党95周年”讲话提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坚定“四个自信”，到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强调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是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行系统阐述的阶段；直到党的十九大宣告进入“新时代”，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进行归纳和概括，这一思想的形成发展经历了不断深入、系统展开的过程。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九大用“8个明确”和“14个坚持”概括了其核心内容，具有十分科学严谨的内在逻辑。一是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明确“总

任务”是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8]这就结合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确认了党和人民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二是围绕“怎么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明确“五位一体”是总布局，“四个全面”是战略布局，强调坚定“四个自信”；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要求，阐释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等其他工作的具体要求。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引领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基本战略方针。三是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的问题，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制度最大优势是党的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基本要求。这就深刻揭示了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实践主体作用。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意义

党的十九大在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进行系统归纳和概括的同时，还将这一思想写进了党章，使之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深刻体现了这一思想的重大意义。

这一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不断发展并显示出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党始终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有机统一起来。这一思想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力求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和精神实质。同时，又始终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立足于我国发展实际和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以具有原创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这一思想实现了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它集中回答了当代中国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体现了党和国家的根本政治立场，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时代性、创造性、人民性的新论断，解答了一系列“大是大非”的问题，在“坚持什

么”“反对什么”的问题上旗帜鲜明，展现出了强大的真理穿透力、实践引领力、文化自信力、价值感召力，为党和国家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中国梦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奠定了牢固思想基础。

这一思想为建设美好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中国共产党既是为我国人民谋幸福的党，又是为人类发展进步而奋斗的党。这一思想坚持以关乎人类命运为基点，凸显了坚持中华文明主体性与彰显我国现代化实践性的统一，把当代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的积极探索和宝贵经验加以理论化、系统化，构建了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体现中国文化独特优势，又独立于西方模式和西方话语的思想体系、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之路，为实现全球治理和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的智慧和方案。

实践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永无止境。立足于新时代，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置于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深入研究，并使之与新的实践紧密衔接起来，揭示其不断创新发展的内在逻辑，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历史、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而且有助于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引领我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事业的不断发展，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更好地拥抱未来，争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更大胜利。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1.
- [2]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96.
- [3]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16.
- [4] 全国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组委会. 毛泽东与当代中国——全国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41-42.
- [5]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
- [6]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
- [7] 胡锦涛. 胡锦涛文选：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04.
- [8] 本书编写组.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5-16.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n the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PRC and the Great Leap in the New Era

Tian Keqin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70 years ago,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has gone through an unusual road. With the convention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El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eading the masses of the people has entered into a new era and opened a new journey on the basis of a series of great achievements and historic changes, through the unremitting efforts and continuous exploration of the "two 30 years" before and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Based o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utting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70-year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New China to research and making it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new practice, revealing the inherent logic of its continuous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which will not only help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history deeply and bear in mind the Party's initial aspiration and mission, but also help us embrace the future better, take the long march of a new era, and strive for greater vict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new china; marxism; sinicization; the new era